

文庫博物館專集（六十二）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天空已经阴云密布，“文革”导火索已经点燃。十日，上

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二十五日爸爸到了上海，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上海。上海的各种报纸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的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告诉爸爸，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文章很不高兴。并对他们上海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毛泽东还交代了，什么人也不要讲。陈丕显说，他什么人没有讲，但觉得爸爸可以例外。爸爸听了这个消息，叫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来。二十六日下午，爸爸陪同毛主席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在客人未到时，爸爸向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未看。”毛泽东笑了笑，未说什么。

晚上，爸爸看到江青，江青也对爸爸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还说：“现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回到驻地，爸爸赶快给彭真打电话，他在电话上认真地对彭真说：“姚文元评海瑞的这篇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经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大约同样的时间，周恩来也向彭真打了招呼。所以，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这篇文章。

爸爸做完这些事情心安理得地离开上海之前，对毛泽东说他准备到苏州去看林彪。毛泽东神情开朗的嘱咐爸爸：“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象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点的报告。”毛泽东情真意切地将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爸爸说至少到这个时候，他和毛泽东之间还是晴空万里。爸爸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爱戴和追随了一辈子的伟人毛泽东。

在苏州，林彪不动声色地接见了爸爸。听说爸爸的到来，叶群星夜从搞四清的地方赶回来，在近旁的一间屋子里偷听。爸爸象往常一样向林彪汇报了工作。整个谈话过程，爸爸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反而觉得这次和林彪的谈话显得比往日轻松些。

这时候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召开整爸爸的上海会议，仅仅十天。

十一月三十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好几个月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这封信甚至对爸爸连名字都没有提起，但林彪让叶群带给毛泽东的随信附去的十一份材料除一份是刘亚楼（原空军司令，已死于当年五月——编者注）给爸爸的信之外，全部是揭发爸爸的材料。

关于叶群带这封信，到毛泽东那里都说了些什么，由于林彪和叶群非常有先见之明地采取了口对口的告状方式，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档案。现在，所有当事人都已经作古，我原以为，这会永远成为一个谜。但历史的机缘有时非常神妙。1996年九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张作为当年中央警卫团主要负责毛泽东警卫的领导，是这一事件的准当事人。在这本书里竟然有整整一节叫

做“叶群向毛泽东密告罗瑞卿”，活画出当年叶群向毛泽东密告爸爸时一些人物的形象。不可不读：

——1965年十月，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

1965年十一月下旬，杨成武同志（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后接替罗瑞卿任“代总参谋长”——编者注）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一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约我到 he 那里去一趟。

接到电话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了。

到了他的会客厅，见了面，没有说几句话，叶群笑容满面地进来了。

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毛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

我接过信说：“好，我交给主席。”当即将信装进衣服口袋里。

这时，叶群神秘地离开了会客厅，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折了回来，对我说：“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

我说：“好，你当面交。”我将信又还给了她。

这时杨成武对我说：“很久没有见到毛主席，很想看一看毛主席。”

我说：“我给你向毛主席报告一下。”

我没有别的事，便告辞了。

回到主席这里，我将上述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报告。

毛主席“噢”了一声，没有讲别的什么。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护士长吴君旭通知我，要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来。

我给叶群打了电话，便站在大门口等她。不多会儿，叶群来了，进了头道门，我对叶群说：“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

谈话进行到两小时，不见叶群出来。我进去催了第一次。

到了三个小时，我进去催了第二次。

时间已过四小时二十分钟了，我实在耐不住了，又进去催了第三次。

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讲什么。他们谈了差五分钟五个小时，叶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三次催叶群，只能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样子。”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有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位置的。”“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

当天下午，叶群回到苏州，她在电话上向吴法宪（空军司令——编者注）说我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罗长子的问题，你不要外传。

对于毛泽东下决心整罗瑞卿，是否是因为听信了林彪和叶群的这回事，我同意妈妈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在后来说过，他整爸爸是因为他对林彪“偏听则暗”，但此时，如果不是另有原因，他才不会被林彪更不会被叶群的意见所左右。事实是，在林彪要毛泽东帮助他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的时候，毛泽东心里正涌动着更大的革命波澜，为了除掉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们，他需要林彪作为盟友。所以罗瑞卿成了革命棋盘上一个需要牺牲的棋子，成了毛泽东这位平衡大师的一个砝码。为了革命是什么都可以牺牲的，为什么罗瑞卿就不可以？

在叶群杭州告状的第八天，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专门是为了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会议开始的时候，爸爸正风尘仆仆地奔波于边防线上，执行着他总参谋长的职责。

妈妈回忆当年的情况说：

——1965年12月9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行是计划的一部份。10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的时候，阎红彦、周兴（当时云南省的党政领导人——编者注）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大家谈一谈我是很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知瑞卿到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们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的。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啊。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我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是给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子保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答也是去了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准备好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是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会议开始之前，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之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会议给每个人发了一袋子文件，也就是叶群送来的那11份材料。这些材料只许参加会议的人在会上看，自己保管，自己交回，不准秘书经手。会议上最活跃的人物是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她做了三次共约10个小时的发言。这些发言的主要意思是说爸爸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叶群编造了大量的细节来证明她的这些观点。但是这些事件的证明人不是林彪叶群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秘书。还有一个刘亚楼，但是他已经死了。对叶群的这些冗长琐碎的语言，与会的大多数人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只说了四个字：“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的所有发言里，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刘亚楼说的，即爸爸要他转告林彪的四条，要林彪让贤的事。但是这时候刘亚楼已经死了。邓小平说这是“死无对证”。最可敬佩的是爹爹（朱德）。在会上他竟然表示同意爸爸反对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提法。他说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不能讲已经是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会后，爹爹心情很不好。他的夫人康克清妈妈回忆道：

——1966年1月下旬春节期间，朱老总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杭州。见面后，我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我关心地问：

“你有什么不好过？”

“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

“不会没有什么吧！”

几十年的相处，我对他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他不舒心的事，经我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他烦了，喊了一声，“不要问了！”

过了一会儿，老总的秘书悄悄对我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长等职务。以后我问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情不畅，他叹了一口气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爸妈在上海会议召开的第三天到达上海。妈妈回忆说：

——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来通知飞机定在10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定在10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要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10点钟飞就10点钟飞吧。

上海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在，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的事情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但我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知道是建国西路618号，原来作过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车，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楼下看看，不准。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别让安电话机（瑞卿原来走到哪里都要先安自己的电话机的）。我说不让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7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

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么也没有力气走上楼梯了。我搀着他走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问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也知道，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痛哭了一场。但是，这不能使我稍微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变故，我想我们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整个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瑞卿参加会议。说是要背靠背。瑞卿要求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说清楚。总理对瑞卿说，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瑞卿当时想见的就是这两个人，不让见，别的还见什么人呢？所以，哪儿也没去，就在那个小院子里。从11号到上海，一直到17号离开，这期间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家等着。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同志，谁来了就和谁谈。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谈话，只能谈完了，听瑞卿讲一讲，他说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这几天里，看得出来，瑞卿从一个生龙活虎、坚定自信的人一下子变得无可奈何。不能参加会议，又不能去见主席，受着天大的委屈，无法辩白，真是说不出的味道。这五天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院子里走一走。那个院子有一条不到20米长的通道。我们就从住房的门走到院子的门，到了收发室往回走。就这样一来一回地走。那时已经有人在监视我们了。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心情出去。就是心里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后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来对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讨别的。”

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

回答：“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瑞卿回来告诉了我，我就对他说：“关系不好，那就检讨关系吧。”

所谓关系不好，就是说瑞卿在工作中不尊重老师。刘伯承同志听到这个说法，就说：“我这个人身体不好，进城后不能做什么工作，罗长子还是往我这儿跑，有事同我商量，我倒没什么感觉。”

16号，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辆车来看我。他们三个在楼下谈，卓琳就上楼来找我。她劝了我一阵，我就问她：“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了些什么文件？”

卓琳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后来，贺龙同志的夫人薛明回忆说：贺老总也是这样，发了文件就自己装在口袋里。后来，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也不让她收拾整理一下。

我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解解闷。”她还特别对我讲：“我对你说的这些话，都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也没有见什么文件，是我自己有这么个感觉。”

17日，我们和总理、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回北京，在飞机上我碰到了张茜。我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她说，陈老总没开完会就走了，说他有事，又没有什么好说的。

到了北京，原来我们因为修房子而暂住钓鱼台。瑞卿很自觉，觉得那里有外宾，不好。我们就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

后来，爸爸在自传里这样描述他上海会议以后的痛苦心情：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即写了报告给主席、中央，请求调离我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和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并将批准及我的报告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长以上。并将电报抄给了我。

因我不在军队工作了，军委办公厅来人撤了电话机。我还要秘书将我的枪、猎枪和秘书们的枪都交上去。彭真同志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秘书，说猎枪可以保留一支给孩子们玩。我说，不要留，全部交。

我曾经要求出去理个发。组织上交待说，不要去，以免碰到熟人。以后，我除了到301医院拔了一颗牙，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

回到北京后我住在新六所。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有一天，吃中午饭接近尾声，爸爸对我们所有在座的人说：“将来我退休了，带上你们都回四川老家去。咱们四川可是个好地方呐。”爸爸的声音是轻松的，声音里还带着笑。这句话引起了全家人一阵小小的欢乐。

爸爸不能不觉得，上海会议是毛主席和林彪对他的误会。他相信有一天，他能够解释清楚。实在不行，退休，带着我们全家人回四川老家，就是他所估计到的最严重的后果了。

不久，妈妈发现她上街的时候后面有人跟梢。她告诉爸爸，爸爸说那你就尽量少出去吧。妈妈就更多待在家里，待在爸爸身边。

妈妈回忆说：

——快过春节了，我们回到城里自己的家。中央一些负责人都来找瑞卿谈，但是还是不准见毛泽东和林彪，只让写检讨。说是没有上海会议上说的三条，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关系问题啊，对老师够不够尊重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啊。瑞卿自己一面写检讨，一面看毛选，尽量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从重检讨。写好检讨，送上去，康生先说不行，说是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要写。瑞卿万般无奈，实在检讨不出来。然后，小平同志就说：“检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这样的安排，我看瑞卿还是能够接受的样子。他也想安静安静，想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很认真地看毛选，还想读一点哲学著作。

可是还是安静不了，3月份会议突然来了。3月3日下午瑞卿接到通知说，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常委决定开个会，是专门解决你的问题。下午通知，3月4日上午就开会。瑞卿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因为小平同志刚刚说了让瑞卿好好看看书，搞个半年左右，怎么忽然又开会呢？

这个会一开，问题就严重了。不是上海会议上提出的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那三条了，瑞卿一下子就被说成反党反毛主席。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被编造出来。说什么瑞卿上林彪家去说，病号嘛，就是要休息。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还在走廊上把林彪家的猫踢一脚，大声说：走开！这些事情真是闻所未闻。可是硬是有人证。那就是林彪的老婆、女儿，还有秘书。统统是这些人亲耳听到的。

最让瑞卿受不了的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本来林彪说瑞卿反对他，封锁他，这些问题瑞卿还是顶得住的。我也抱着很大的希望。直到三月会议前，都觉得这个事情是会弄清楚的。因为我们觉得毛主席是了解我们的，毛主席是会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的。在上海时毛主席说过：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对我。还讲没有三条就挂起来，可以挂一万年。

可是三月会议一开就不是这样了，完全成了敌人，什么混进党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军队中的赫鲁晓夫。比武硬说瑞卿没有向中央报告，是“擅自大比武”，瑞卿当然知道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记不清了，让秘书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状态。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还有那30本马列的书是冲击学毛选。另外还有很刺耳的话，瑞卿听了从来不跟我说，怕我受不了。人家那么整他，但他还是很坚强。说得多么刺耳，他还是听，还是每天都去。而且坚持不能说的话就是不说。有一些公安方面的事情就更不能说了。我觉得瑞卿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这种搞法，造谣、诬蔑、人身攻击。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可坚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可是他还是挺着。早上起来，吃了饭就准备去。可是回来就不行了，连楼梯都上不动，第二天还是照样去，检讨照样写，但是每天回来都上不动楼梯。他去开会，我在家里连书都看不下去，我就等他，一听到车响，就赶紧到楼梯下面接他，把他扶上来。每天回来都是这样。问他，他也不说，就是走不了路，不吃饭，晚上也不睡觉。我晚上去看看他，他就在那写检讨。他把窗帘拉得严严的，谁也看不见。

爸爸好像是因为在太长的时间里，太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和有责任的人而得到了报应。他更不幸的是处在一个狂热代替理智的时代。总而言之，这些参加三月会议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从发现爸爸比自己低贱的喜悦中得到在这个疯狂世

界上继续生活的勇气。否则没有办法解释他们在这个会议上对待爸爸的态度，为什么和反犹主义者在两千年中对犹太人的迫害一样荒谬绝伦。

3月3日，邓小平和彭真约见爸爸，对爸爸说，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对你反映很强烈，常委考虑要开个会，彭真报告主席，主席说，他也考虑开个会，会议明天开始。邓小平要爸爸做好充份的思想准备。他对爸爸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做充份的思想准备就是了。”从党内斗争的角度来说，邓小平比爸爸有经验得多，所以他后来可以经历三次大起大落，还成就了后毛泽东时代一番改革大事业。他大概知道爸爸是从没有在党内挨过斗争的人，所以，他希望这种提醒可以帮助爸爸渡过难关。

但是邓小平的提醒还是落空了。爸爸的思维数据库中没有这样的储存，就算有人提醒，有人播种，但爸爸的心灵里没有这样的土壤。所以悲剧还是发生了。

3月4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数月不见的与会者，原来都是爸爸最亲密的同志，他们或者是爸爸爱戴、尊重的上级，或者是爱戴他、尊重他的下级，现在都变成了路人或者仇敌。所有人都换上了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发罗瑞卿反党、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爸爸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

对于爸爸这样洁身自好、清澈如水的人来说，三月会议给他罗织的各种罪名，“野心家”、“阴谋家”、“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代理人”，哪一个都可以使他七窍流血。或者，话反过来说，如果爸爸能对人类天性有更多了解，如果他能从毛林的关系中发现他们正在结盟的蛛丝马迹，他也许就不会采取这么激烈的方式，就能从自己和他人的存在中找到更复杂的意义。

只要细想一下，这样的蛛丝马迹原本比比皆是。在上海会议期间“背靠背”的时候，有一位和爸爸很相熟的人去驻地和爸爸“谈”。爸爸谈到情急处，激动地问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那人也是情急之下冲口而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呀！”但爸爸就是不懂这点人性中的缺陷，就是不能充份理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千古明训。不久，他又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去见毛泽东和林彪，他觉得他无论见到他们其中的哪一位，都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周恩来说恐怕不方便见吧。爸爸急切地说，那我给林彪打电话。周恩来也激动起来，他在电话里大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是的，爸爸是太天真了！他把应该由同类一起来承担的道德理想背在自己身上，他无所畏惧地触动了人类隐秘丑陋的天性，他不幸处在一个历史的“独裁”时刻。

1966年3月18日，天阴无风。爸爸吃了早饭，从桌上拿起他装满检讨的公文包，准备去开会。这时候，秘书桌上的电话响起来，军委办公厅通知说今天的会暂时不开了。

在这一刻，爸爸下定了自戮的决心。

如果说爸爸一直希望向党向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说清事情的真相的话，从他接到暂时休会的通知的这一刻起，他却忽然明白了，这一切根本是不可能的。不是事实本身无法替他辩污，而是那些关键人物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些真相。实际上是这个发现使爸爸方寸大乱。他赖以立脚的基础和他的精神殿堂都在这一刻哗啦啦地坍塌下去，转眼变成一堆废墟。如果事实真相已经不是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么他为之奋

斗了一辈子的东西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呢？一向崇高圣洁的信仰忽然变得无法理解，甚至面目狰狞。爸爸形容这一刻的心情时说：“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当生活变得太残酷的时候，死亡就显得温柔和光明了。

爸爸伏在案上写下遗书：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爸爸写好这张字条，把它放在抽屉里。

爸爸推开妈妈的房门，妈妈正拿着一本书读，妈妈回过头来看爸爸，爸爸说：“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爸爸轻轻地带上了房门。

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爸爸回到自己的卧室，换上一身洁净的睡衣和一双家乡四川出产的布底鞋。为什么是睡衣和布鞋？爸爸此时想到的是什？永远的安息吧，是彻底的回归家园吧，我想，在这个诀别生命的时刻，是这两样东西大大安慰了爸爸的灵魂。随后，他轻手轻脚，形容镇定地走上了通往顶楼的楼梯。在走上楼梯之前，他迟疑了一下，想了想，百般珍爱地脱下那双家乡的布鞋，端端正正地放在楼梯旁。

顶楼只有一扇小窗通往平台。这扇窗太狭小了，我猜爸爸通过它时一定十分费力。多年来，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这番情景，爸爸高大的身躯正固执又急切地通过这扇小窗。窗外的平台是毫无遮拦的，爸爸踩着已经和理想一同破碎的生命走完最后几米，投向一片虚空。

这一天，家里所有的孩子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们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爸爸在院子水泥地上留下的血迹已经被细心地冲洗干净。妈妈告诉我们爸爸得了感冒，住进医院了。那天晚上我们家的屋顶下，只有知道真相的妈妈通宵未眠。

□ 摘自《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

∞ ∞ ∞ ∞ ∞ ∞ ∞ ∞ ∞ ∞
革命成功之后——点点回忆父亲罗瑞卿的感悟
• 单世联 •

点点即罗点点，原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的小女儿，近年来写了若干有关罗瑞卿的回忆文字，发表于《当代》一九九八年第四、五期的《点点记忆》则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篇，因为它不仅仅是为父辈歌功颂德或叫屈鸣冤。

罗瑞卿的下台始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之前，毛、林联盟已经形成，罗下台已是必然。点点这样解释这次会议：

“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大火药桶，但它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代表国家政体的严肃大党。虽然这个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为组织原

则毕竟还是写在它的章程里。所以毛泽东还是不得不召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的上海会议，使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瑞卿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这回事。”

但这个会议谈不到有什么民主：一、事先知道会议内容的，只有毛、林、周三人，连刘少奇都不知道；二、被整的罗一到上海就被软禁，根本没有权利参加会议，更谈不上解释和申辩；三、以政治局名义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却是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唱主角，她在会上作了三次共约十个小时的主题发言；四、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不以叶群的发言为真，却丝毫不妨碍会议通过毛、林事先定下的结论。

党史上有各种各样的“扩大”会议。“扩大”使组织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与会者，以便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去。有“扩大”就有“缩小”，“缩小”就是不通知本应到会的人，“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领袖可以参加中央全会，党代会选出来的正式中委却无权与会。这就强化了毛的“一言堂”，他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决定让谁参加会议，收“一致通过”之效果。

“开会”还有一个功能是逮捕人，罗瑞卿是一例，此前罗本人也奉命在开会期间逮捕过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此后还有周恩来逮捕黄永胜等人，华国锋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开会的名义。后人也许难以设想当时一些高级领导人接到开会通知时的复杂心态：接不到通知固是失宠；出席了会议也许永远就与会议无缘。

罗瑞卿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邵华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但邵华执意要去，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不知就里，以为是罗主动的安排，很不高兴，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了。

“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邵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政治局常委会是全国最高决策会议，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被认为是最神圣、也最神秘的会议，但决定罗列席不列席的，竟然只是毛个人的好恶。更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来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改变毛的印象的，不是什么组织原则、工作要求，也不是权威人士的说情或罗本人的解释，而是毛的护士。毛的近侍影响力之大，此是一例。

建国后政治整肃不断，开国元勋和高层领导不断被打入囚牢，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罗瑞卿和彭德怀被关在同一监狱，周扬与胡风一度处境相同，这使人们几乎谅解了罗、周当年的过火行动，但这两种人的命运其实并不一样：

“爸爸在一九七四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总则在这一年十一月因肠癌不治，逝世在三〇一医院十四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一个走廊的病房里。”

在党内生活尚有一点规范时，毛整谁不整谁还有个影子、有点根据，比如彭德怀在大跃进问题上确实想“操毛的娘”，人民永远感谢彭德怀是真实的，但毛个人永远不能饶恕彭也是真实的；但罗瑞卿从未反毛，毛对此也很清楚，只是当时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罗。对毛来说，彭、罗是不同的，彭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对手，罗则是他和林彪结盟的代价，一旦事过境迁就可以放他一马。

“文革”期间天下大乱，几乎所有的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许多毛的亲信。但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中，对“走资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罚方式，开几次批斗会，是留在北京还是赶到外省等等这类问题，毛都是有严格区别和掌握的，最典型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氏辩证法有一条原则，叫作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

党史上被打倒的人很多，但其处境和结局很不相同。大体上说，“文革”前打倒的，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是万劫不复的；而在“文革”中被炮轰的人，到七十年代中期，已有不少人官复原职。

比如贺龙，一九五九年后贺曾是彭德怀专案组的组长，彭德怀的事情尚未了结，他自己也被捉了进去。一九七五年毛亲自下令为贺平反，彭德怀却只能病死在监。这也是周扬和胡风的区别。

罗瑞卿自杀后，旨在批判他的“三月会议”停开了。

“但是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他们说爸爸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的行为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

党内斗争的残酷性，非身临其境者不能领略。其源盖在“伟大领袖”，但毛之所以能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是因为一些其他领导人也习惯于这种残酷的斗争方式。在一切都取决于毛个人的意愿的氛围中，很多问题并非原则之分、主义之争。整倒一个人就会为其他人留下位置，身边不断有人倒下去，反可以显示自己的正确，可以借此向领袖表忠心。

成功的革命夺取了控制一切的权利，胜利者拥有了乐园，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就是保护革命的成果。作为一个集体，党内任何派别、任何个人对任何“反党行为”都严惩不贷，只有党拥有这个乐园，党内个人才可能分等级拥有自己的小乐园。毛对此十分清楚。“九一三”事件后，点点去找当时任中联部长的耿飚，回来的路上：

“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脚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们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子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的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

权力就是乐园。身居党、政、军十五个要职时，罗住着既大又美丽的房子和院子，家里一大堆秘书、参谋、警卫员、管理员、司机、保育员、厨师等服务人员，“院子里还有齐刷刷五个漂亮年轻女人”。罗失去权力后，人去楼空，“妈妈开始自己做饭，剩下来的工作人员日益与我们为敌”。要是罗部长在位，这些人纵有一百个胆也不敢。在罗被捕后，整个家就没了。这就是权力意义。

权力来自何处？理论上讲来自人民，然而不但人民、就是高级将领，也没有决定罗为总参谋长的权力。刘亚楼告诉罗：林彪说“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

，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罗的权力来自林彪，更来自毛泽东。毛可以让位极人臣的刘少奇、林彪死无葬身之地，也可以让写文章的秀才一步登天。

罗自杀前给妻子的遗书是：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一九七七年恢复工作后的罗瑞卿：

“在百务缠身的情况下，还担任了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委员会主任。无论在这个以革命为主题的世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对毛泽东的信任和爱戴从未动摇过，他始终是这个伟大天才革命家的忠实追随者。”

但罗清醒了一些，一九七八年，他支持《解放军报》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他不认为毛泽东可以逃避历史的检验。

这种情结可以见之于一大批老革命家。朱德长期受毛的冷遇，失意时种一点兰花都不被允许，但点点看望康克清时了解到：

“原来这年的八月，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随后，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城头易帜，共产党失去政权，国家解体。康妈妈面对突然的事变十分痛心，每天要花大量时间读书看报，劳累过度，才发病住院。”

确实，如果社会主义都要被否定，这些从死人堆中爬起、在残酷清洗中幸存下来的革命家的一生还有什么意义？

点点不这样看：

“但是我还是感到一种虚无，因为我最怕认真地做一件事情，那原因却只是一个错误，或者叫做误会。”

罗瑞卿是认认真真做事的，对毛更是忠诚，但却被一脚踢开。他本人可以不计较，但在标榜绝对的理想主义和革命原则的党内，却闹出“文革”这样的悲喜剧，这种理想与原则的可信性就大可怀疑了。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从来不允许对党有半个不字，对革命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坚决否定，那么结局是两种，一种恶梦醒来，认定一切都是虚伪，世上本无所谓理想与原则，从而导向犬儒主义、享乐主义，这在一些“老同志”及其子女的身上已经表现出来；再一种是继续非理智、非反省地坚持原来的价值信念。谁能说哪种更好些？

点点把罗瑞卿的被整与犹太人相比。犹太人为什么受迫害，她认为这和犹太民族拥有太完美的理想和太彻底的责任感有关。犹太人的命运是否与其理想品格有关姑置不论，但罗的遭遇可能并非因完美的人格。在抓胡风、整彭德怀时，罗扮演的是帮凶的角色；在毛面前，罗既无独立人格，也谈不上犯颜直谏。以至当他和彭德怀关在一起时，还感到委屈：“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作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确实，罗不能和彭相比。从彭德怀下台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党内的生活已极不正常了，而罗恰恰是在此时飞黄腾达的。如果承认这段时期党犯过错误，少不了有罗的一部份。

但点点的这一比较还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她说的：

“当有人自认为有最完美的道德和献身精神的时候，他就得罪了整个人类，就激发了深藏在人类天性中这种邪恶的迫害欲，就在理论上沦为受迫害的犹太人。”

萨特的名言是搞政治一定会把手弄脏。罗也许并不高尚，但比其不少同侪还是好一点，所以党内有人说他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点点没有就事论事，她有许多反省和总结，比如：

“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付出自己与他人的双重代价。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坚硬决心，在一切人身上留下累累伤痕，包括在儿女们的身上。这种为信仰牺牲一切的悲壮故事会被现代人理解和原谅吗？当然问题并不在于任何人的理解和原谅，而在于理想化的人生给世界和他人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多少大奸大恶假至诚至爱之名，猖獗盖世大行其道。这是所有真诚善良者，包括真诚善良革命者的不幸和悲哀吧！”

在基本肯定革命理想与政党原则的前提下，这是对现代悲剧所作的最好的自我批评。但有几点不宜混为一谈。首先，付出的代价是不是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其次，既已认准大奸大恶假至诚至爱之名在祸害人类，这里的问题就不是至诚至爱的理想本身，而在于这些奸恶。党内之所以无休无止的整肃，就在于缺乏基本的“诚爱”。如果说点点不爱她的姥爷和姥姥是因为有阶级之分的话，那么在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中间，除了“爱”伟大领袖，他们之间又有过什么样的诚、爱呢？

“文革”把多年来左的路线发展到极端，空前的灾难使得人们由此上溯，向毛和对他的一些思想质疑。但各人的契机不同。点点记得一九七〇年冬天，她到刘少奇儿女家去，在一特别的气氛中，刘园园点了几支蜡烛，举起酒杯说：“今天是爸爸的生日，让我们祝爸爸平安。”

“自从三年前，‘文革’开始的那个早春，我在落日前作出那个寒冷的决定：与爸爸及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以来，我从没有想过走出这条思路。尽管身边发生的‘文革’事件已经越来越血腥，越来越滑稽，完全像一个恐怖笑话。但是我除了让自己尽量去理解它们之外，没有作过任何别的尝试。园园的话使我如梦方醒，或者简直是汗毛倒竖！我第一次想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所有的事情。”

点点是在乐园中长大的，她没有经历过诸如延安整风之类的洗礼，遭逢一个革命至上的时代，她的乐园是革命制度带给她的，她理所当然地听从毛的号召，与爸爸划清界限。只是乐园已失之后，刘园园的话才使她想起乐园其实是她爸爸的权力。

但罗瑞卿的觉悟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的。

“一直到坐了班房，在他还在想这一切是毛主席和林彪对他产生这么深的误会的时候，九大的消息传到了这个临时监狱。所有的犯人因此而被允许看报纸。爸爸说：‘我看到叶群的名字写在中央政治局的名单里，我就想，这些人恐怕要完蛋。’说来奇怪，爸爸的恍然大悟没有因为他的裂骨折筋而发生，没有因为他被装箩筐，受到惨无人道的批斗而发生，没有因为妻离子散而发生。而当他看到党的政治局名单上出现叶群的名字，他却想到这些人要完蛋了。”

罗确实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他可接受加诸在任何一个身上、包括他自己身上的暴力，只要是以党和革命的名义。既然革命永远神圣，毛永远正确，那么再大

的暴力、甚至让一个高级官员瞬间受尽凌辱直至死亡，他都认为是合理的。对他来说，极左路线、个人崇拜等等都可以不是问题，党内民主、党员权利、生命价值等等都可以被献上革命的祭坛。无论发生多大的悲剧，包括他个人的毁灭，都无损革命的合理与伟大。唤醒他觉悟的，只能是另外一种东西，这就是悲剧演变成喜剧，他愿意以生命献祭的革命成为滑稽戏。所以当他发现他曾极度鄙视的叶群也进了他一直认为神圣的党的最高机构时，他才获得从不同角度审视“文革”的可能性。

点点很动情地引用了伏契克的一句话：“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要警惕什么呢？点点认为：

“今天我懂得了，几个战争狂人或者某种专制制度都不是世界上的最大危险。最大的危险是隐藏在人性深处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失去尊严，回归兽性！”

问题在于，人为什么会失去尊严、回归兽性？点点转述她妈妈的回忆，批罗时的一条罪状是“擅自大比武”。罗瑞卿当然知道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记不清了，让秘书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情况。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人的尊严，连人的权利、党员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确实，几个战争狂人、某种专制制度都不是最大的危险，但像罗所遭遇的这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制度肯定是最危险的。它的特点是，除了毛一个人以外，任何人都可能被它碾得粉碎。当刘少奇、罗瑞卿支持毛整彭德怀时，他们已经为自己挖好了坟场。

点点记忆的每一节，都以弥尔顿《失乐园》中的一句话做引子。点点的乐园，不仅指她刚生下来时的暖箱，也是指罗部长在南池子的大院子，更是指革命政权赋予她的种种特权和优越。罗倒台后，乐园失去了。曹雪芹以《红楼梦》来表现失乐园后的沧桑感怀。点点也体会到深沉的人生况味，沉郁清怆。

“文革”中失去的乐园有许多在“文革”后又得到重建，通过子女“接班”，乐园可望风景常在。点点的不幸在于罗瑞卿的复出“仅仅一年”，作为罗的亲属，她当然还会有许多照顾和好处，但只能算是罗的余荫，显赫的罗家毕竟不会家道复初。

点点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会了对生命价值的认同，这使她习惯于“乐园”后的普通生活。但她还操心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既往习惯的正确立场的根基发生了根本的动摇，二十世纪发生的所有事情让许多话题已无法讨论。”但点点的态度是明确的，她以康克清对苏联巨变的焦心作结，这里并无讽刺的意义：

“在她面前，我们这一辈人显得多么懦弱渺小！对这样一位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切的革命老妈妈，我有权力说：我不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后代、或者我平生只作过一名庸俗的医生吗？我们这些不肖子孙，让我们奋斗了一生的前辈，在垂暮之年如此惊悸不安，黯然神伤。我们难道不该羞愧吗？”

这一代人也许是渺小，然而，堪称高大的上一代人给人民带来了什么？点点亲历其过程的五、六十年代培养的革命“接班人”在“文革”中做了些什么？

“窗外夜色正苍茫”。失去乐园的点点引用了《失乐园》的一句话来表达她的无奈和隐忍：

“手携手，慢移流浪的脚步，告别伊甸，踏上他们孤寂的道路。”

我们应当为此欢呼。

□ 节选自《书屋》杂志

~~~~~

【千古奇冤】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拾纸救夫

• 冯骥才 •

1978年35岁 男 S省E市驻军支左人员

1978年31岁 男 S省Y县某公社小学语文教师

那时，我是驻扎×省×部队坦克师二团的一个搞宣传的干部。一九七三年接到上级命令去到鲁西南地区一个县“支左”。这期间社会上的“文革”已经相对平稳，呼杀喊打声稀稀落落，清队的狂潮也过去了。我们的任务大多是解决前五年动乱时期遗留的各种问题。

这个县地处当年水泊梁山的旧址，县招待所传说是宋江的乌龙院，还有一个残破的塔，也是那时遗物。我们“支左”人员总共一百零八员，和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正好巧合。我们笑了，说一百零八将回梁山来了。谁不想看看《水浒传》里的水泊梁山？出发时的心情相当愉快。

可没想到，这八百年前草莽英豪奔突出没之地，至今依然十分荒僻。地处黄河边，一片盐碱地。头年大水泛滥留下的淤泥，春天又旱得满地大碎泥片子，柳树芽子没蹿出叶儿就干死在枝上了。真荒凉呀！地貌也不对，完全不是《水浒传》里所描写的崇山峻岭，不过一个个小山包儿。可这里的人还是那股子劲儿，大襟在前头一挽，腰带一扎，怀里揣着狗肉和酒，随便坐在哪儿就吃狗肉，豪饮，性子也很极蛮。有一家子打架，儿子拿铎一下削掉他老爹半个脑袋——我就处理过这事。“文革”初期两派武斗便往死处干了。我们住在县城里，为了工作便利，我作为军代表进了县革委领导班子，临时当一名常委。没过几天，大批含冤告状的就找上门来。有的冤案叫你想都想不出来，过去不是有本《今古奇观》吗？我看有的事完全可以续进去。

一天，我在宿舍里，一个挺瘦的人，戴一副圆眼镜，进门趴在地上就给我磕头。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你要想给俺解决问题，俺就说；你要也想应付俺，就明说在先，俺扭头就走，这个头就算白给你叩了。”

好一个有性格的人！我说：“每一件事我都会认真对待，怎么能应付你。”

他说：“我这事难办。”

我说：“我不怕难办，只要你说真话。”

他拿一双灰眼珠紧盯着瞅了瞅我，坐在凳上给我讲了一桩旷古罕闻的奇冤。我听罢就知真冤。我必须先讲过这件事才能说为什么真冤——

这人姓李，在离县城三四十里路、紧挨着潘金莲老家的一个公社小学，当语文教师。此人善讲故事；无论听来的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故事，全能记住，装满一肚子。张口就来，很少重样儿。他属于那种在课堂上随意发挥的老师，课讲得活，趣味



横生，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听他讲课时生怕听到下课铃。你知道，小孩子们上学都是最爱听到下课铃的。你想想这人的故事多有魅力！

六五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也是“文革”的前身了，人们争着要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便回过头来，翻箱倒柜，查找有哪些对毛主席不忠的人和事。反右派时各单位抓右派，都是从上边下比例数的，按人员比例定右派。从那以后，一搞运动，不揪出人算没成绩，渐渐发展得揪出的人愈多成绩愈大，于是学校里就一轰而起找起来，上上下下一同回忆。这位李老师性情急躁，得罪过一些同事。有位教师提出，一次他听李老师讲过，毛主席当年在浏阳被白军追得趴在水沟里藏身，这是赤裸裸诬蔑毛主席。伟大领袖怎么会被敌人追得趴在田间水沟里藏身，故意歪曲毛主席的伟大形像！马上翻遍学生们的书本，查看听课记录，终于在一个学生的语文课本里找到当时听这故事时记下的一行字：“毛主席藏身水沟，摆脱敌人尾追的机警故事”。证据确凿，这就以“特大现行反革命案”上报县委。马上县公安局来人把他捕走。他不服呀！他说：“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毛主席胆略过人，机警智谋，我是真心歌颂毛主席呀！再说这故事又不是我瞎编的，是从书上看来的。”公安局叫他说出是哪本书，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没有根据，就是他编的，这是抵赖和顽抗！很快，很简单，判他八年刑，打入监狱。

他老婆是个乡下女人，跟他结婚一年多，有六个月的身孕，带着大肚子探监时，他跟这乡下女人说：“八年的日子可不算短了，你要受不住，跟俺离了，俺也绝不怨你。可是得实话对你说，俺绝没坑害你，那故事确实是俺从书本上看来的呀……”这女人转身就跑到县里喊冤叫屈。县领导说：“你去找，只要你找到这根据，我们就放人！”

乡下女人心实，把这话揣在肚子里，就四处找开了。这时，“文革”已经开始了，县城的小书店里除去毛主席著作，别的书全没有；图书馆也封闭了。她找到图书馆员，求他。图书馆员哪有胆量去揭封条，散布封资修呀。他是县城看书最多的人，可他也没读过这么一个故事。这女人就到处去找书，找不到书就拾印字的纸，从纸上找。她不识字，拾到纸便请亲友或小学生给她念，听听有没有那故事。有时拾一块当时印的“文革”小报，也拿去请人看。她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妇女，没文化，哪知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书，文字里究竟都是些什么。当人念到什么科技的、政治的、文化的那些古怪难懂的话，她一动不动站在一边傻听，傻等，等那故事的出现。有人看烦了，草草扫一眼，就说：“没有了。”她也信，再去找。有人劝她：“你靠拣纸，哪能拣到那故事，你又不认字，天底下那么多带字的纸，你哪能都拾来？”可谁也说不动这女人，她依然天天提个破篮子在街上拾。只要发现一块带字的纸，就如获至宝。别人手里有张带字的纸，求不到手，也要请人念给她纸上写着的是什么，人家要是不肯，她就跪下来求人念给她。甚至连在茅房发现一张有字的纸也拣出来，涮乾淨叫人看。天天拾，天天求人念，天天找不着。天天早上的希望在晚间破灭，但她从不灰心。她坚信那故事不是她爷们儿编的，坚信早晚一天能找到这个故事。这么久了，自然有点疯疯癫癫。

孩子小时，她背着孩子拾；孩子大了，她领着孩子拾。拾到的纸，不是，就卖掉糊口。那时，水泊梁山方圆百里的人都见过这么一个带着孩子拾废纸的半疯的女人，都见过她那双总是东张西望却空茫茫的眼睛，都见过她始终提着的那装满烂纸的破草篮，但未必都知道她决非拾纸度日，而是为了一个辉煌的愿望——救夫。

一年到头，春夏秋冬，雨雪风寒，从没有停过一天。心诚未必能感动苍天。她整整拾了七八年纸，可是在她爷们儿刑满前半年的一天夜里，灶膛里的火，引着了堆满屋角的废纸，着了大火。这女人和孩子活活被烧死了。

李老师在狱里听到消息，自己也不想活了，几次自杀都没成。那种县城的监狱

一无所有，一是因为穷，二是怕犯人拿什么东西自杀。连吃饭用的碗，使完跟着就要走，怕犯人摔碎后使碗片割脖子。有一次，他去上厕所，看见茅房地上有根麻绳，就拴在房梁上，再两手抓住房梁把身体拉上去，套住脖子，一松手想吊死。可是麻绳糟了，“啪”地断了，一个马趴摔在地上，摔得他眼冒金星，但当他定住神再瞧，出现了奇迹，有张油印的纸片就在眼前地上，上边正印着要他命的那个故事，简直不可思议！真比小说编的还巧，还绝，这才叫“天无绝人之路”呢。你不信吗？这是真事呀！这纸片破烂不堪，故事断断续续，是：“……追他的人大喊起来：‘跑了，跑了！’……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个水沟里……。”虽然不全，但是可以拿它证明那故事并非是他编造的了。他拿着这纸片冲出茅房，又喊又叫：“找着文了！我的冤平了！”兴奋地一蹦一蹦，蹿得老高。看守以为他疯了，把他锁进牢房，他捧着那纸片大笑，然后又大哭，肯定想起他白白拾了七八年纸却还没等到这一天的那个可怜的乡下女人，还有那糊里糊涂被烧死的儿子。

他写了一份申诉，连同这纸片递上去，心想就等着平反雪冤，出狱了。可没过几天，县里说这纸片是油印品，仍然没来源和出处，不能作为依据，把他的申诉驳回了。但这次他非但没绝望，反而更有信心。有这纸片，迟早会找到这故事。有一阵子，他在监狱里忽然害怕是自己真的记错了，怕这故事并不是看来的，而是谁瞎讲给他的，那就永远无招无对。现在这个可怕的疑心病不再折磨他了。心里有了光。

他来找我这天，是他刑满八年刚被放出来不久，案并没翻。小学校因为他是服过刑的反革命，拒绝他回校工作，没有工资，自然也没有路费去大地方找那本书，那故事。他无家无业，孑然一身。穷得穿一件单褂，经不住春寒，直打哆嗦。

听完他的经历，我说：“你回去吧，这事我可以给你解决。”

他见我这样乾脆的回答，不信。仿佛有打发他之嫌，可是他万万没料到，他碰巧了——这故事我读过，我知道在哪本书上。我热乎乎觉得自己完全有力量，把压在他背上八年而至今犹在的巨石推掉。

第二天，我到县革委调他的案卷看了。他所说的完全真实，便在县革委会上把事情摆出来。有人说：“这人就是怎么治也治不服他。”

我说：“法律不治人的性格。这故事绝对有，判刑，冤了，一定要平反！”

我是军代表，有权威性，他们不好反驳我，可他们默不作声，不表态。我挺有气，当即要一辆车回部队，把这本书拿来，放在县革委会桌上给他们看——

一本紫红色封皮的革命回忆录，文革前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书名叫作《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打开书，其中一篇就是这故事《浏阳遇险》，作者是谢觉哉。写的是毛主席在一次赴江西根据地途中，路经浏阳，为了摆脱白军追赶，机警地藏身水沟而安然脱险的一段往事。

当时县革委的头头们看着这书都怔住，没话。只有一个自言自语说：“怎么谢老会写这篇东西？”

一个山村教师，就因为讲了这篇歌颂毛主席的故事，被当作反对毛主席而坐牢八年，家破人亡，这难道不是一桩千古罕闻的奇冤？我紧盯住这案子不放松，很快给他平反了结。那天，李老师跑到我家来，趴在地上，又给我叩个头，这个头叩得却是有板有眼呵，如谢救命恩人。我当时倍感惶惑，我不过正巧也看过这故事罢了，我又有何德何能接受这个大不幸者叩的这个头呢？我沉默良久，不知讲什么，只

说：“是呵，是呵……。”

随后，他请求我把这本致使他妻死子丧、坐牢八年的书送给他。我知道这本书在他生命中的重量，沉甸甸放在他一双颤抖的手中。事后我听说，他把这本书烧了，将纸灰洒在妻子的坟上。大概企望他那苦命的乡下女人的亡魂从此获得安宁吧！

李老师的冤案一翻，找我告状，求我平反的人，天天堵满我的门口。后来我复员回到老家安徽，省委调我到岳西地区去搞落实政策，真没想到那个小小县城里，冤案也是堆积如山。含冤抱屈的人都是连夜排队找我，从我来到我走，也没间断。而且再没一个和李老师那案子一样容易办。各种稀奇古怪的冤案很难插进手，插进去就把你的手缠住。我才知道，凭我个人力量，无力解决这时代创造的无比巨大的悲剧。我每天只睡几小时的觉，凡可能解决的就绝不放过；难以解决的，我回去时一一向省委组织部门作了汇报。

以我的感受，大人物的经历不管多悲惨，也不能和小百姓们相比。大人物的冤枉总容易解决，小百姓们如果没碰对了人，碰巧了机会，也许很难得到命运的晴天，就像梁山的李老师正好碰上我读过使他冤屈的故事那样。我想，至今天下还有多少人含冤未平，无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的？

—— 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

※ ※ ※ ※ ※ ※ ※ ※ ※ ※

附：《浏阳遇险》

• 谢觉哉 •

一九二七年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资格并受湖南省委的委托，到铜鼓去领导驻军起义。一块去的共有三个人，走到浏阳时，被团防军逮捕了。

团防军押着他们走，毛泽东同志在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他掏出一把钱来，对团防军说：“朋友，拿去喝茶吧！”那些人接了钱，他就走。没有走出几丈远，那些人喊起来，其中有一个人追到了他跟前，他只得站住，又给了追的人一点钱，并且说：“没有了，朋友，再见吧！”等他走上前面的岭上的时候，追他的那个人才大喊起来：“跑了，跑了！”跟着大队就从他后面追来；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个水沟里。他听见追的人在喊：“明明看见他向这里跑，怎么不见了？”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找到他躺的那个地方。

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涂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看见有个打柴的，他对打柴的喊：“喂，下面打仗！”“什么事打仗呀？”两个人于是走到一起，交谈起来。谈到农民协会，打柴的说：“农民协会好，只是不该打菩萨！”他回答说：“不错，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请救我一救吧！”打柴的很惊讶：“怎么救法？”他说：“这是两块钱，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一块请你买一点饭，并且请你带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打柴的说：“可以，你就在这里等着！”

天快黑时，打柴的来了，拿来了草鞋和饭。并且从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泽东同志送到江西地界。毛泽东同志问他姓名，打柴的始终不肯说出；他哪里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呢！

麻烦还并没有完。走了一天，到了一个市镇，那地方情况也有些紧张了。毛泽东同志没有行李，身上穿一件短褂，一个汗衫，他便把短褂脱下来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每走到一家店门口时，就问：“老板，歇得客吗？”老板眼睛一睁：“歇不得！”连碰了几个钉子。走到街尾最后一家店时，他索性不问了，走进去坐下，大声喊：“老板！打水来洗脚！”老板无可奈何，只得由他住下。第二天，到了准备起义的驻军里，于是轰动世界的湘、赣、闽、粤的工农革命运动，就从此开始了。

（原载《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

□ 原载《一百个人的十年》 冯骥才著

∞ ∞ ∞ ∞ ∞ ∞ ∞ ∞ ∞ ∞

文革期间哪些名人自杀了

• 童志刚 •

文革是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恐怕既有的任何统计都是相当不完备的。

下面这份“档案”仍然以“不完备”为特点，只收入了在“文革”中自杀身亡的各界名人（缺科技界资料）。

◇ 邓拓 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 田家英 1922年生于成都。1948年8月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解放后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

◇ 李平心 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后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 老舍 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 陈笑雨 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 陈梦家 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

、《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1966年9月3日自缢身亡。

◇ 言慧珠 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 叶以群 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 刘盼遂 1896年生，河南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 阎红彦 1909年生，陕北安定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系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解放后历任四川省委书记兼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因对“中央文革”所作所为强烈不满，于1967年1月8日凌晨吞服安眠药自杀，并留下遗言：“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 李立三 1899年生，湖南醴陵县人。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曾领导过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五·卅运动。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短短两个月中遭受14次无情批斗殴打之后，决心一死了之，当晚服安眠药自杀。死前留下了“致主席”的遗书。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为其平反。

◇ 陈璉 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璉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1979年3月上海市委为其平反，胡耀邦曾为她题写了“家庭叛逆，女中英豪”的赞词。

◇ 赵慧深 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份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 罗广斌 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 严凤英 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 容国团 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

房中自缢身亡。

◇ 杨朔 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 储安平 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1957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为。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 傅雷 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 翦伯赞 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 上官云珠 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 周瘦鹃 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 李广田 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 吴晗 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自杀身亡。

◇ 顾而已 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 闻捷 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 王重民 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根据手边非常有限的资料，除上述自杀身亡者外，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各界知名人士还有：

- ◇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1967）
- ◇ 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贾拓夫（1967）
- ◇ 作家田汉（1968）
- ◇ 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大将（1969）
- ◇ 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1969）
- ◇ 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
- ◇ 国务院副总理陶铸（1969）
- ◇ 海军参谋长张学思（1970）
- ◇ 作家赵树理（1970）
- ◇ 文学评论家邵荃麟（1971）
- ◇ 文学评论家侯金镜（1971）
- ◇ 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1974）
- ◇ 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1967）
- ◇ 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1971）
- ◇ 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1969）
- ◇ 教育部部长何伟（1973）
- ◇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委南汉宸（1967）
- ◇ 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1972）
- ◇ 监察部部长钱瑛（1973）
- ◇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
- ◇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
- ◇ 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
- ◇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锡五
- ◇ 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1967）
- ◇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
- ◇ 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以及原工大的赵宗复（1966）
- ◇ 中宣部的姚溱（1966）
- ◇ 中科院地质所的谢家荣（1966）
- ◇ 中国作协的冯大海（1967）
- ◇ 天津统战部的孟秋江（1967）
- ◇ 南开大学的许政扬（1967）
- ◇ 音乐学家沈知白（1967）
- ◇ 古典文学专家李嘉言（1967）
- ◇ 南开大学的饶毓泰（1968）
- ◇ 佛学家喜饶嘉措（1968）
- ◇ 文学评论家胡先（马肃）（1968）
- ◇ 文学评论家陶然（1966）
- ◇ 小说家孔厥（1966）
- ◇ 小说家陈翔鹤（1969）
- ◇ 戏剧评论家伊兵（1968）
- ◇ 小说家彭柏山（1968）
- ◇ 中科院物理所的张宗燧（1969）
- ◇ 美学家吕荧（1969）

◇ 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范长江名著文学史家刘绶松等。

这些人有的是自杀，有的是被虐杀（一般书中统称为“受迫害而死”），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含冤、含恨离开人世的。

□ 原载《美洲文汇周刊》第一三二期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             |           |                                                                |
|-------------|-----------|----------------------------------------------------------------|
| 本期责任编辑：     | 华新民（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本期 校对：      | 吕 青（加拿大）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读者技术咨询：     | 月 边（芬兰）   | <a href="mailto:cnd-help@cnd.org">&lt;cnd-help@cnd.org&gt;</a> |
| 网络技术维护：     | 李健民（澳大利亚） | <a href="mailto:cnd-info@cnd.org">&lt;cnd-info@cnd.org&gt;</a> |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吕 青（加拿大）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华夏文摘》主编：   | 李彤彬（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CND》总编：    | 熊 波（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 hz 或 gb-uu 编码版）以及 CND 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 服务站地址：[ftp.cnd.org](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  
[canada.cnd.org](ftp://cnd.org)[142.132.1.13]: pub/cnd/hx

WZ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